

走向东亚“知识共同体”

彭浩

八月上旬，在渥美国际交流财团组织之下，围绕东亚地区“国史对话”的论坛又一次在日本北九州市召开。此次论坛主题设定为《“蒙古袭来”与十三世纪蒙古帝国的国际化》，中日韩蒙四国学者齐聚一堂，针对蒙古帝国的扩张对东亚地区的冲击展开了广泛的讨论。作为一名史学研究者，笔者有幸参加，并参与了之前的准备策划，自然不乏感触，借此随笔，聊叙一二。

首先，值得强调的是，此次论坛与一般的国际学术会议相比，有着更广阔的“现实关怀”。虽然以“蒙古袭来”这一历史事件为关键词，但不仅仅是讨论其来龙去脉，或时代背景，而是借此素材，探讨如何摆脱民族国家史观对历史认识的桎梏。许多历史学者已经意识到，在民族国家史观的束缚之下，各国人民的历史认识变得僵化，且易于为政治所诱导，政治诱导下的历史认识又常常会影响到国家间的关系，及国民间的感情。所以克服民族国家史观的负面影响，会有助于我们更冷静客观地认识历史，从而也有益于解决羁绊国家关系走向和解的所谓“历史问题”。

正如许多与会者所言，中日韩三国学者，或者两国学者围绕各国的历史展开的“对话”并不罕见。其中，有政府主导下的“对话”，也有民间针对具体课题、研究方法、史料利用等展开的专业性较高的学术“对话”，各自的主旨和目的也不尽相同。根据三谷博先生的观察，从会后各国“对话”者之间的关系来看，似乎民间层面的“对话”更易于开展。不过民间的史学“对话”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往往趋向高度的学术化和专业化。由于人文研究者易于沉醉于各自的研究专题，不爱过多追求研究的社会意义，这种“习性”或者说“惰性”，往往使得“对话”在如何促进大众的历史共识方面难有长足进展。且民间的学术交流受科研经费影响较大，很多“对话”项目因经费支持问题只得半途而废，难能可贵的交流成果，尚未能在学者之间达成共识，更难言改变普通民众的历史观。

而由此取得突破，正是此次论坛值得期待之处。刘杰先生起草的论坛宗旨中使用了“知的共同空间”、“知的平台”等用语。这里的“知”字意义广泛，包含了汉语中“知识”和“智慧”的双重含义。也即，通过国际论坛展开多角度的学术讨论，以便生成较为可信的历史“知识”；在各方学者确认之后，通过多种渠道进行推广，以致形成全民层面的共识；在此新的知识环境之下，也就容易生成突破国家史观束缚和解决有争议的“历史问题”的智慧。这一点在具体专业性研讨不断深入之际，也特别容易被忽视，为不忘初衷值得不厌其烦地反复强调。

在做一简单宏观回顾之后，再回到具体史学问题的探讨上来。作为首位报告人，四日市康博先生对于蒙古帝国在欧亚大陆东部的扩张做了全面的介绍。结合其他与会者的发言，可以归纳为：在这种冲击之下，蒙古要素自然影响到中国及其他东亚地区，而另一方面，蒙古在征服中国之后又继续向周边扩张，中国要素也被随之波及周边，造成这些地区“中国化”或“中国化”程度的加深。

近年“新清史”的讨论向我们展现出清朝统治多元一体的形象，如清朝皇帝不仅是中华

的“天子”，也是满族和蒙古族人的大汗，还是藏族人的“文殊菩萨”，可谓面对不同人以不同的面孔。而不仅称号如此，对于不同民族的统治，清政府也采用了各种因地制宜的策略，形成多元复合的政治文化。而与清史相比，蒙古帝国疆域之广，不难想象其统治文化之多元性更为复杂。而做蒙元史研究之际，蒙文史料极为有限，其在东亚的活动主要依赖汉文资料得以还原。由此，在现代人特别是现代中国人的历史记忆中，蒙元的形象容易被作为一个汉化的中国正统王朝所认识，而蒙古人作为统治者的主体性和蒙古帝国的文化多元性却难以彰显。近年来杉山正明先生的一系列蒙元史著述，虽然在专家中不乏争议，却通过富含想象力的生动描述，让普通读者也得以领略到蒙古帝国的高度国际化和文化多元性。将这种原本应有的历史感觉，且许多专家在研究中已经获得的历史感觉，通过超越民族国家史观的历史叙述还原于普通民众，仅就于此也值得高度评价。

在论坛第二日综合讨论的环节中，刘杰先生整理出几个重要论点，其中之一就是如何在国史叙述中较为准确客观地传达出这种多元复合的状态。具体而言，与这次话题相关的历史具有鲜明的双重复合性：一是，作为中国史一个时代的元朝；二是，作为蒙古帝国一个局部的对华统治。那么，在作为“公共知”来理解时，应如何处理这一课题呢？对此，与会者提出各种意见，其中，葛兆光先生的发言给我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在延续现有国史叙述，即作为中国史的一个王朝——“元史”进行记述的同时，增加一些在东亚史，在欧亚史等广域层面应如何理解的叙述。民族国家这一种现存的政治形态虽然有各种弊端和局限性，但还没有在人类史上立即消失的迹象，所以完全摒弃民族国家史观也非朝夕可待之事。这种双重历史叙述有利于纠正单一性“国史”叙述的偏颇，使读者易于获取客观把握历史的宏观视野。

另外，与其后的各个时代相比，缺乏一手史料也可以理解为蒙元史研究的难点之一。对此专家们采用何种方式去克服，也是我较为关心的问题。作为听后感，可以简单归纳如下：根据编者的立场和意图对各类编撰资料进行批判性解读；多方发掘和运用图卷、雕塑、服饰等非文字资料；结合人类社会史的发展常识进行逻辑推测等等。除各位报告人之外，出席此次论坛的多是以其他时代为研究对象的学者，所以此次论坛非但可言“国史”间的“对话”，也为不同时代史学者提供了交流方法论的平台。不难想见，这种交流也同样裨益于东亚各国间“公共知”的生成。

大阪市立大学经济系副教授 彭浩